

习近平的用典艺术

□杨立新

去年，我应人民日报出版社之约，为《习近平用典》一书作典故释义。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中引用的典故查找原典、加注释义，我深深地感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取精用宏、驱遣自如，在古典和现代之间自由穿行、游刃有余，所引典故体系完备、脉络分明，充分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揭示并彰显了包孕其中的时代精神。

习近平善于用典，精于用典，堪称用典大家。其用典范围之广、数量之大、频率之高，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非常突出。习近平古典文学素养深厚，经史百家，藏诸脑海，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他通过广泛采撷中国传统经典名句，巧加化用，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表现力和历史感；同时，这些典故与其大众化的语言配合使用，使得典故运用自然，与文意相得益彰，形成了独特而富有魅力的语言风格。习近平的用典艺术，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信手拈来 妙用天成

习近平用典随处可见珠玑，多有佳妙之处。其用典信手拈来，却又恰到好处，自然挥洒，妙用天成。

如2014年3月27日《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法国有一句谚语：“一点一点，小鸟筑成巢。”中国也有一句古语：“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中法友谊是两国人民辛勤耕耘的结果。借此机会，我要向这些为中法友好事业默默奉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首先引用一句法国谚语，拉近了与法国人民的距离。然后用中国老子《道德经》中的话与法国谚语巧妙嫁接，嫁接点为：“辛勤耕耘结硕果”。最后轻轻一句归结：“中法友谊是两国人民辛勤耕耘的结果。”不足90字，将中法友谊讲述得妙趣横生，摇曳生姿。

再如2013年10月7日《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

“浩荡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亚太是我们共同发展的空间，我们都是亚太这片大海中前行的风帆。亚太未来发展攸关亚太经合组织每个成员的利益。

“浩荡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出自唐末僧人尚颜的《送朴山人归新罗》的首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气势恢弘的海景画卷。但中国古代的渡海诗很多，习近平为何选择这首？

朴山人是朝鲜族华隐士，因此这是一首写给国际友人的赠别诗。唐朝去朝鲜的海路一般从登州(今蓬莱)出发，横渡黄海。而黄海是太平洋西部的一个边缘海，因此用这句诗来描述亚太经济合作是绝佳之选。

老典新用 点石成金

习近平会通古事今情，他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抽取有用的史实或理念，运用到现实中，对典故进行飞跃性的点化，从而赋予老典以新的思想或境界，化腐朽为神奇。

如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上面这条典故出自《左传·昭公七年》，文字佶屈聱牙，属于僻典。习近平在引用时进行了生动通俗的阐释，读之轻松自然。他以此告诫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像正考父一样严格要求自己，把位置放低一点，少些自满，多些干劲，堪称触处生春，别开生面。习近平用典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大众化的特点，这既体现了他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也体现了他始终坚持的群众观点。

如盐溶于水 浑化无迹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习近平虽然勤于用典，但无一有意为之，丝毫不露用典痕迹，做到“用事不使人觉”，达到了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

我一直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思想的口子一旦打开，那就可能一泻千里。干部不论大小，都要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不以恶小而为之”。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撤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这段话中，习近平一连引用了7处典故，除3处为明引外，其余均为暗引。

如文中的“慎独”“慎初”“慎微”均为用典。最后一句中用了“以人为镜”的典故，从而为党员领导干部干部树立了一今一古两面“镜子”——焦裕禄和张伯行。

把典故藏在文章里，平平道出，略不作意，这是习近平的用典特色。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习近平在这段讲话中使用了大量典故，却仍能保持语言的生动活泼，明白如话，确实达到了用典如盐溶于水的境界。

化用原典 夺胎换骨

习近平用典而不为典所用，他不是简单地套用前人的成典，对于一些不合时宜的典故进行化用改造，或改其字，或袭其意，或用其语，做

到夺胎换骨，后来居上，显示了高超的运化翻新能力。其化用典故方法有三：

1.改字借用：即改用个别字句，既保存原典的精神，又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如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引用的“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是对《荀子·大略》中“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的化用。习近平从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高度出发，将原典中不负平生所学的“如学”，化用为坚持读书学习的“为学”，一字妙改见匠心。

2.句意化用：即融会前人的句意，用自己的言语重新组织起来，既有所本，又出新意。

如1989年1月《干部的基本功》一文：现在我们非常强调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万真心实意地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群众。“治政之要在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古人议政的这句话，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这段话中的用典，是对明朝张居正《请疏积逋以安民生疏》中“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的化用。原典中的“致理”意为使国家安定清平，但颇令现代人费解，影响传播效果，改成“治政”就清楚明白多了。

3.组合化用：即将内容相关而出处不同的句子组织起来，形成合力优势。

如1990年3月《从政杂谈》一文中引用的“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化用自苏轼的两篇文章。“临大事而不乱”，出自苏轼23岁应制科考试的试卷《策略第四》；“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出自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的《陈侗知峡州制》。

这两条典故源自苏轼不同时期的两篇文章，各有其特殊语境和深刻内涵，习近平通过寻找它们之间的共通点和交汇点，将它们巧妙地组合起来，形成了全新完整的语句，弥见创新之力。

密集用典 气势贯通

习近平不仅用典广泛，而且善于密集用典，在一段话中有时数典并用或连用，通过典故的巧妙组合，形成浑融有机的整体，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

如2004年1月5日《心无百姓莫为“官”》一文：古往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深林”，都充分说明心无百姓莫为“官”。

在上面110字的短段中，习近平一气举出了范仲淹、郑板桥、杜甫、于谦4人的语典，浑然一体，气势贯通。通过多典连用的烘托和渲染，充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心无百姓莫为“官”。其用典之密，可谓典如潮涌，让人目不暇接。

以典喻理 以典证今

习近平善于从浩瀚的古代典籍中，寻找根据，发现论据，来证明文章所要论证的道理。借典故发表议论，融典议为一体。

如2014年4月1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

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习近平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句中国著名的典故，生动阐释了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道理。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体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以典喻理，援古喻今，一则小小的典故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也让人们熟知的典故变得别有意味。

近几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断裂与传承有了更加紧迫的认识，对古典艺术之美重新又重视起来，很多老作家、艺术家甚至年轻人热衷于古典诗词创作，从中体味传承几千年的文学之深味、之绝美以及对文心、人心的滋养。比如陈伯坚的新作《诗词曲三百首》，就让我感到惊喜、欣羡。

我和陈伯坚先生相识相交已经近40年了。从最初的握手言欢，一见如故，到后来的坦诚互对、推心置腹；从翩翩潇洒的青年学友，到须发斑白的古稀老人，数十年的沧桑岁月，浓缩了彼此间深厚的情谊。在漫漫的时间长河里，鱼雁往来，把两颗赤诚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彼此情同手足。因为这么多年的交往，我知道伯坚不仅是立意遼远的小说家，还是文笔新颖的散文家，他的那些丰厚的带着时代气息的佳作，经常陪伴在我的案头枕边。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是一个创作中国古典诗词曲的行家里手。

开卷第一篇是《品秦牧先生赠词》。我以为作者把这首诗放在卷首是很有深意的。人们都知道，秦牧先生是近代中国的文学大家，特别是他的散文，立意隽永，笔锋流畅，创一代新风，为广大读者所热爱。伯坚身居粤海，近水楼台，得以近距离地接触这位文坛耆老，自然受益良多，特别是还得到老先生的亲笔题词一幅，更是倍感荣幸了！题词曰：“智慧勇敢和毅力是所向披靡斩关夺隘的战士——陈伯坚同志存念”。不仅铿锵有力，而且振聋发聩，伯坚受之，当然心潮激荡，故而挥毫舒展当时的心意，诗曰：

智慧当为先，大勇推向前三。
致胜赖毅力，三因勾股弦。
人生关隘多，片刻在变迁。
一路如战将，把酒玩攻坚。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伯坚对秦牧老先生题词精神的领会，而且也显示伯坚践行这种精神意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生命的长途，他一直是实践着这个精神的。

和伯坚相交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多情重义的人，不管是老友还是新知，不管是远亲还是近邻，他都是披肝沥胆，坦诚以待，即使是至亲挚爱的人，亦复如是。因此，在他诗文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这种中国文人的传统美德。从《爱之描述》一诗中，我们可以领会其中的甘味。诗的全文如下：

相信苦与乐，两心同一舟。
得到与付出，何须放心头。
学会忘律给，学会惜金收。
不为繁缛计，不为功利愁。
不冀他人美，不屑坎坎坷。
一心向所爱，长河唯东流。

初看诗句浅显易懂，似觉一目了然。但仔细琢磨，则感其含意深邃、隽永，再三咀嚼，仍觉回味无穷。恰似我国某些文学大家作品的

白描，色浅味浓，同时也显示作者学养之深厚。

伯坚出身于华侨世家，大学毕业后，努力工作，事业有成，但是，他却一直藐视权贵，眼睛向下，深深的民主思想，浓浓的平民意识，从他的诗词中，随处可见。比如《唐由之“抗旨”》中那位可爱的眼科医生，“最怕喝酒”的市委书记，应聘小店散工被拒的退休副总理，陈毅元帅的岳父重住破旧小屋的佳话——这些篇章，都是伯坚随手拈来的“民间传说”，他刻意以诗词的形式记录下来，晓谕广大读者，是有其独特的深意的，和坊间某些崇尚权贵并为他们大唱颂歌的“大作”，成了鲜明的对比。

伯坚思想开阔，平日博览群书，知识面甚为阔大，不仅精于文史，对哲学、美学方面，亦多有涉猎。因此，在这部“诗词曲”中，我们随意可以读到这方面的内容。诸如：《厚积落叶听雨声》中对美学大家朱光潜生活情趣的欣赏，用“何处不藏美，矢志调心情”轻轻一笔带过，却使读者产生无穷的美学回味。对大自然之美，则有另外一番心得体味。比如，作者对一道河的“河湾”流水的缓急，居然产生了一种美学意义的遐想，从“流水力不露，缓急显气度”到“深浅不改性，大海是前途”。一湾死水，被作者写活了，而且赋予无限生命的活力，让读者产生无穷的美学想象，显示出作者对美执著的追求。

谈伯坚的古典诗词，很难用几句话或几方面来概况其全部内涵和要意，真正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是这样的，读者很难一下子窥其全豹。但是，作品所蕴含的要义，我们却可以一语道出，那就是深远的家国情怀。因为伯坚的祖先世代流落异国他乡，对祖国的爱，对家乡的情，对祖先的恋，流淌在他的血液中，充盈在他的灵魂深处，用“诗词曲”进行表达，对伯坚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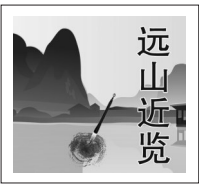
诗词曲的艺术形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粹。从春秋战国的《诗经》《楚辞》，到先秦两汉的乐府；再从“唐诗”“宋词”以至“元曲”——这是我们的祖先用汉文字饰体绘形创造的世界独领风骚的奇葩，是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学而时习之”的课程。伯坚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深谙其中“三昧”，故能够从他的胸中流溢出这样华美的乐章来。

当然，“金无足赤”。伯坚的这部丰厚的佳作，也有需要提高的地方。比如，中国的古典“诗词曲”作，在修辞上是很讲究的，不仅要求合辙押韵，还要求工整、对仗，对这些千百年形成的“老规矩”，伯坚没有刻意遵循，而是依照自己心灵的驱使，信马由缰，不以词害意，强求格律整齐，从而使曲任意挥洒，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在强调“百花齐放”的今天，伯坚的这一点是“不足”，还是“特色”，值得探讨。

我虽然钟爱古典诗词，但不善创作，这次“门外”之言，仅作文友之间的一种心灵上的沟通，愿伯坚和其他方家一察。



张大千作品



中国知识分子的千秋家国梦，各有各的做法。现代中国30年，启蒙初开，道路横呈，何去何从之际，反而是知识分子们最有肩扛天下的自觉时期。道路的选择虽然不同，其间确有许多慷慨悲歌，置生死于度外的光荣与梦想。诗人徐雉，以前说起他，只关注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写入文学作品的人，但他以文弱之躯，党外之身，献身于抗日第一线，战乱中甚至不知埋骨何处，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他是真正的诗人！

徐雉，1899年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河头市村（现属于宁波镇海区）。徐家是一个大家庭，徐父是秀才，曾在乡间行医，也曾开私塾执教。徐雉3岁丧母，由继母抚育成人。长大后他曾听族人说，母亲是死于家族矛盾。14岁开始写旧体诗，16岁入私立宁波效实中学，22岁入苏州东吴大学文科。

大学期间，他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新诗，可以查到的最早作品是发表于1922年4月13卷第4期的《一篮花》《跛足的狗》，最晚为1925年5月第15卷第5期的散文诗《三次的访问》。另有诗发表于《文学周刊》《诗》等杂志。鲁迅曾在《鲁迅沈雁冰的雄图》一文中提及：“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是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可见徐雉不仅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当时且与王统照、叶绍钧等齐名。

徐雉从东吴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1925年10月，徐雉前往广州，投笔从戎，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任科员，在林伯渠手下工作。这一时期，他在政治部的刊物和宣传品上发表了大量诗作，现在能找到的已经不多。小说《嫌疑》描写毛泽东探望林祖涵这一情节，是他根据亲身经历描摹而成。这是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也成为讲到徐雉不可不提的一点。

徐雉：主动赴难的诗人

□郑绩

宁汉合流之后，他抛掉身外之物，仅着一身布军装逃回宁波。1927年秋，他去芜湖投奔朋友，在海关谋到一个办事员的职位。他曾写小说《办事员莫邪》，对这段心酸经历有细致的描写。1928年失去职位，回到上海任《商报》副刊编辑，薪资极少无以糊口，他又写了不少新诗和短篇，卖文为生。1932年到《申报》任《业余周刊》编辑。

抗战爆发之后，先流亡武汉，继于1938年先去西安找林祖涵，后奔赴延安。当时他年近四十，身体衰弱，更有高度近视几不能视物，家中又有稚儿幼女，然而他既不西去重庆谋求教职，也不南下新加坡当编辑，而是坚持要去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第一线。虽然左倾，但他不是共产党人，也没有参加左翼职业革命活动的经历，他甚至不是“左联”的成员，从第六军出来后最接近中共组织的活动是在上海世界语协会中热心参与过一段时间。以这样的政治身份，当时因国难流亡的作家群中，作此选择者，实在不多。

之后徐雉接上了在第六军时的生活，先在边区文艺抗敌协会工作，又到晋察冀军区、边区任秘书，主编《边政导报》，写了不少长篇散文诗。1942年随年老体弱的一些干部被送到陕北加入边区文艺创作组，患上严重肺病，还是有不少诗发表于《解放日报》。

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家人却迟迟得不到徐雉消息，四处打听寻找未果，听说他随部到了东北，还曾在《辽宁日报》刊出寻人启事，也没有回音。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经过大量外调，终于知道下落。大致情况是1947年间，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大部队疏散至绥德一带。徐雉受到专门照顾，配有一个勤务员和一头驴子，然而他身体实在太弱，病逝于疏散途中。具体时间、地点竟不可知，埋骨之地也无处可寻。

欣闻南国翰墨香

□程树榛